

# 六四事件全程實錄

◎吳仁華

今年是八九天安門事件三十週年，此時由允晨文化出版公司出版本書，也算是一種紀念。

八九天安門事件分三個階段，也就是說包括三部份內容：（一）八九學運和民運；（二）六四屠殺；（三）六四屠殺發生後的全國性抗議活動和全國性大逮捕行動。

這麼些年來，中共官方和海外民間都出版了一些有關八九天安門事件的書籍，但無論是中共官方還是民間的書籍，記錄都不完整，而且都存在一些問題。中共官方書籍的主要問題是：1. 歪曲事實，甚至捏造「事實」；2. 極力抹黑學運、民運及學生和民衆的行為；3. 刻意隱瞞真相，尤其是隱瞞屠殺真相。民間書籍的主要問題是：1. 資料不全，尤其是關於戒嚴部隊和屠殺的資料不全；2. 對一些重要事件、組織及人物的記錄語焉不詳，尤其是有關戒嚴部隊及屠殺的記錄存在不少錯誤；3. 對六四屠殺發生後的民衆抗暴活動及官方的大逮捕行動少有記錄；4. 忽略北京以外的情況。

八九天安門事件曾經震驚世界，不僅改變了中國的進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蘇聯及東歐共產國家發生劇變。其影響及歷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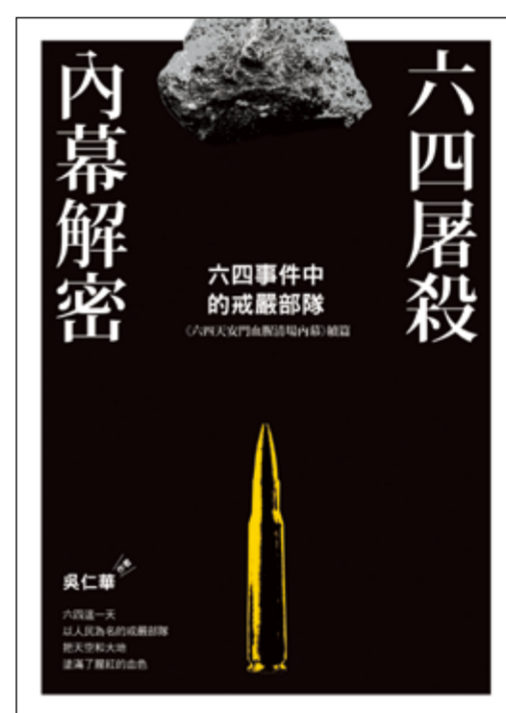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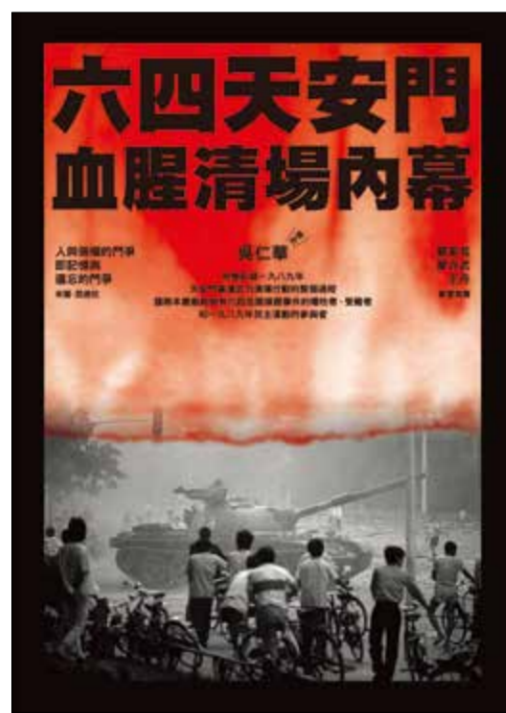
地位遠超過五四運動，應該有一部詳實的書籍予以記錄，絕不能像 1949 年中共建政後所發生的土地改革運動、鎮壓反革命運動、三反五反運動、反右派運動、文化大革命一樣，沒有留下完整的歷史記錄。

本書初稿完成於 2009 年，多年來歷經多次修改、增補。本書從 1989 年 4 月 15 日至 1989 年 6 月 30 日逐日記錄了所發生的事情。可以說，這是迄今為止最詳實、最完整地記錄八九天安門事件的書籍。

本人之所以能夠完成本書的寫作，是因為具有三個方面的有利條件，一是身為八九民運的參與者和六四屠殺的見證人，瞭解和熟悉八九天安門事件中的重要事件、組織及人物；二是在北京大學古典文獻專業（國學專業）歷經七年的專業訓練，先後取得學士、

碩士學位，具有版本學、目錄學、考據學的專業技能；三是多年來從事於八九天安門事件的資料搜集和研究工作，2007 年 5 月出版《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一書，詳細記錄了血腥鎮壓過程；2009 年 5 月出版了《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一書，首次揭示了共有十九支部隊（包括十四個陸軍集團軍）參與北京戒嚴及六四鎮壓，記錄了各戒嚴部隊執行鎮壓任務的情況。

由於掌握最多資料的中共當局至今仍在掩蓋八九天安門事件的真相，加上許多當事人也未能發表親身經歷的文字記錄，尤其是北京以外地區的資料欠缺，因此，本書註定還需要不斷地根據新出現的資料予以增訂，這也正是沒有將此書定名為《八九天安門事件史》或《八九天安門事件史稿》的原因。真誠期待讀者的批評指正。



## 吼叫一九八九：以記憶抵抗遺忘

◎王丹

三十年前，先是幾千青年學生，然後是幾萬知識份子，最後是幾十萬，上百萬，乃至上千萬的人民，陸陸續續走上了北京的街頭，目的地是中國的政治核心地帶：天安門廣場。他們帶著忐忑的心情，懷抱某種失去很久的理想，因為期待著一個美好的未來，而試圖用熱情改變一個政權。炎熱天氣下的汗水，激動到無以言表的心情，隱隱存在的不安，還有因為當下的勝利帶來的喜悅，更重要的，是自己可以改變國家的命運的那種興奮，這些，就是一九八九年中國爆發的大規模民主運動中，普遍存在的情緒。

這些情緒，因為時間久遠，很多人都忘記了。即使是當年曾經沉浸在這種情緒中的參與者們，也都無從追憶了。歲月會抹去很多痕跡，這是我們無奈而必須反抗的事情。而有一種反抗的方式，叫做記憶。而有一種留存記憶的方式，叫做攝影。三泰兄當年就在現場，他用自己的專業技術，對時間的無情作出了反抗。而最終，我們看到了他的反抗成就，這，就是這本關於三十年前那場驚心動魄的民族歷史的影像紀錄。他用大量的照片，留住了無數的瞬間。這些瞬間看似微小，但是因為真實而意義重大，當年的那場巨變，其實，都是這些微小的鏡頭中的活動，

一點一滴地堆積出來的。

三十年了，關於一九八九年的學生運動和那場慘烈的屠殺，有太多文字的東西。我沒有懷疑書寫者的誠意，但是我質疑文字的能力。文字本身就很容易產生歧異，不管作者多麼注意維持事情原本的樣子，但是經過文字的表述，難免都會有一些與事實的偏移，不管是有意還是無意。可是照片會說話，照片最誠實，照片即使是有選擇地拍攝出來的，也都會在某種程度上展現著真實。而關於三十年前的那場運動，沒有什麼比真實更重要的紀念方式了。

我要謝謝三泰兄願意在三十週年的時候出版這本攝影集，更要謝謝允晨出版社和志峰兄選擇記憶和歷史作為出版的主題。當我們都認為那已經是發生在三十年前的事情的時候，我覺得實在需要太多的視覺和思想的衝擊來提醒人們一件事，那就是：沒有什麼是真正過去的事情，所有表面上已經是歷史的事情，都跟今天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今天的中國，之所以能成為今天的樣子，是國共內戰的結果，是一九四九年以後二十多年政治運動的結果，是九十年代以後瘋狂的經濟發展的結果，但更是一九八九年發生的民主運動以及悲壯結局的結果。

我知道很多台灣的讀者會覺得，這麼一件對岸國家三十年前發生的事情，到底跟我們的今天有什麼關係？我們為什麼要去知道和記住這些？對這樣的質問我完全理解，但是完全不能認同。要知道，今天的台灣，最直接面對的，就是中國。台灣不能像鴛鴦一樣，假裝對岸的中國不存在；更何況，掌控對岸的中國政黨——中共——每天都是計算著台灣如何成為延續他們統治的工具，而且不會為了因此而付出的代價皺一下眉頭。此時此刻，了解中國，理解中國，認識中國，對於台灣的未來，是如此的重要；而這一切，都可以從一九八九年說起。這，就是今天我們要了解一九八九年發生在中國和北京的事情，對於台灣的意義。

更寬廣一點來說，不管是台灣還是中國，都是全球華人社會的一部分。Chinese 這個英文單詞，沒有國族，國家，歷史和現實的區隔，可以用來作為定義命運共同體的基礎。在這個基礎上我們應當知道，有些歷史，儘管不是發生在自己身上，但是也是我們應當共同擁有和共同分享的，因為這些歷史，會形塑我們的未來，因為我們的未來，一定會有重疊的影子，這是情緒和意願所無法擺脫的。在 Chinese 的概念下，不同的人群可以

有不同的追求，但是有一天，我們必須找到可以讓我們能夠坐下來好好溝通的基礎。在我看來，這個基礎，就是類似的歷史。中國有六四，台灣有二二八，二者儘管有太多的不同，但是兩者，其實也有很多的相同。你可以去找找當年台灣黨外運動時期留下的那些珍貴的抗爭照片，你在那些人權鬥士臉上看到的堅毅、悲壯和神聖，其實，在這本攝影集中的那些中國抗爭者們臉上，也同樣可以看到，而且，幾乎一模一樣。這樣的共同的歷史影像，是極具有象徵意義的，它代表著，我們內心深處，有一些是共享的。這對未來，意義重大。

回到這本攝影集本身，我最後還有的一點感謝就是，在其中，我看到了幾張自己的圖像。經過兩次坐牢，兩次抄家，以及後來的流亡，我幾乎沒有留下任何當年的影像紀錄，而上天知道，這些對我是多麼重要。多年以前，三泰兄發給我當年在廣場上的照片，免費授予我版權，讓我未來可以使用。這些照片，也都在這本書中。我要再次謝謝作者和出版社，他們讓這本歷史的紀錄，也成為我個人的紀錄。不管多少年過去，我仍然可以真實地觸摸到當年的自己，沒有什麼，比這個對我來說，更加重要的了。

# 吼叫一九八九：廣場上的四十天

◎謝三泰

1989年4月17日，我從香港轉機抵達北京後，直接從機場驅車前往天安門廣場，從那天起，在廣場上見證了中國爭取民主沸騰的熱血和眼淚，也留下一個三十年未完的任務。

身為中國官方首次核准的第一批台灣記者團成員，對這趟採訪是既興奮又忐忑。出發前，同年4月7日才剛經歷了鄭南榕為爭取言論自由不惜自焚的震撼，緊接著被任職的自立報系，指派前往北京採訪，掛念著自焚事件的後續，也還沒從失去好友的傷痛中平復，感覺不應在這時離開台灣，卻又不想放棄這難得的機會，心情很是掙扎。

這是我第一次到中國，此行主要有三項新聞任務，一是亞青盃體操賽、二是亞銀年會、三是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訪中，亞銀年會是APEC的前身，1989年是由當時的財政部長郭婉蓉領軍，彼時蘇聯尚未解體，戈巴契夫訪中可是件國際大事。出發前即獲知中國共產黨總書記胡耀邦過世，北京學生們自發性地在天安門廣場舉辦悼念活動，飛機一落地出關，等不及到飯店放下行李，馬上轉往天安門廣場，想在第一時間拍攝些畫面傳回台灣。那時廣場上的氣氛仍和平，學生們在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周遭放置花圈和輓聯，哀悼、讚揚被視為「改革派」的胡耀邦，同時要求加速中國的民主腳步。

那是個網路通訊不甚發達的年代，數位相機還未上市，為了這趟採訪任務，我扛了一整個「簡易暗房」上路，包括簡便的放大機、顯影藥水盆、暗袋、沖片罐，和加起了百餘卷的黑白、彩色和幻燈片三種不同的底片，最重要的，還有一台當時美國聯合通訊社（AP）獨家研發出的滾筒式相片傳真機。我必須自己沖洗底片、沖印照片，再透過傳真機將照片傳回台灣。飯店房間裡的廁所就是我的暗房，光是一張5x7的相片，單色掃描傳真最短也要耗費上七分鐘，那時上網還是靠電話撥接，萬一中斷了，就得重頭再來過。每天都花很長時間傳照片回台灣，常引起飯店關切，尤其當時下榻的都是國營飯店，動靜多少都被監控中，常傳真到一半傳來敲門聲問，「謝先生你在做什麼？」，要不就是傳到一半被斷線，逼得我好幾次都捨著傳真機到其他同業的飯店裡求救，箇中辛



苦是現在數位相機、甚至手機即拍即傳的年代難以想像的。

除了那三件主要新聞任務，剩下時間我都到天安門報到，第一次感受到緊張氣氛是4月19日，數千名學生聚集在中共高層居所的中南海新華門前，為確保領導人的安危，中共出動武警驅散了這些高呼口號的學生，這是北京學運首次出現暴力驅離的動作，不過，我並不害怕，帶著在台灣街頭征戰的經驗，這樣的場景並不陌生。台灣1987年解嚴後，各式民主運動綻放，街頭請願、抗議如雨後春筍般興起，我恭逢其盛，歷經了520事件等街頭運動的洗禮，帶著在台灣實戰經驗，看著北京剛萌芽的民主運動，心情是無所畏懼的。

但扛著專業相機在廣場上畢竟醒目，常

有人跑來問我「你打那來？」，不想引起太多注意，我多是回答「我是南方來的記者」，偶有人回「你是外省人！」，頓時不知如何回答。某次遇上廈門大學的學生，主動問會說閩南話嗎？兩人就在北京的天安門廣場前，自在地以熟悉的另一種語言交談著。

中國官方報紙沒有任何學運新聞，一個「外來者」單槍匹馬在廣場上跑新聞，消息來源得仰賴「路透社」，意謂「路邊打探來的消息」，才能大略得知學生們的動態。一直到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會成立後，學生們在廣場上刻著鋼板，印刷文宣刊物，統一對外發布消息，才有了較明確的訊息來源。不過，也因學生們進入組織性請願的階段，讓中國官方緊張，加速了日後驅離的動作。

四月的北京夜晚是很有寒意的，抗議的學生們忍受著飢餓、裹著綿被取暖，「飢餓可忍、無民主不可忍」，他們在大字報上寫著，看著令人覺得不捨。為了更瞭解學生們的生活，我跟著學運領袖王丹回到了就讀的北京大學，王丹帶著我去看他們的沙龍（言論學術廣場）和宿舍，小小的二、三坪的間擠了六至八個人，分睡於上下舖，北大生們的物質生活是拮据的，但心裡卻有著遠大的理想。王丹的父母是老師，當時曾問他參與學運爸媽擔不擔心？記得王丹回答跟父母深談過，為了中國的民主自由，他們是支持的，只是那時恐怕誰也沒想到，這場運動會徹底改變了他們的人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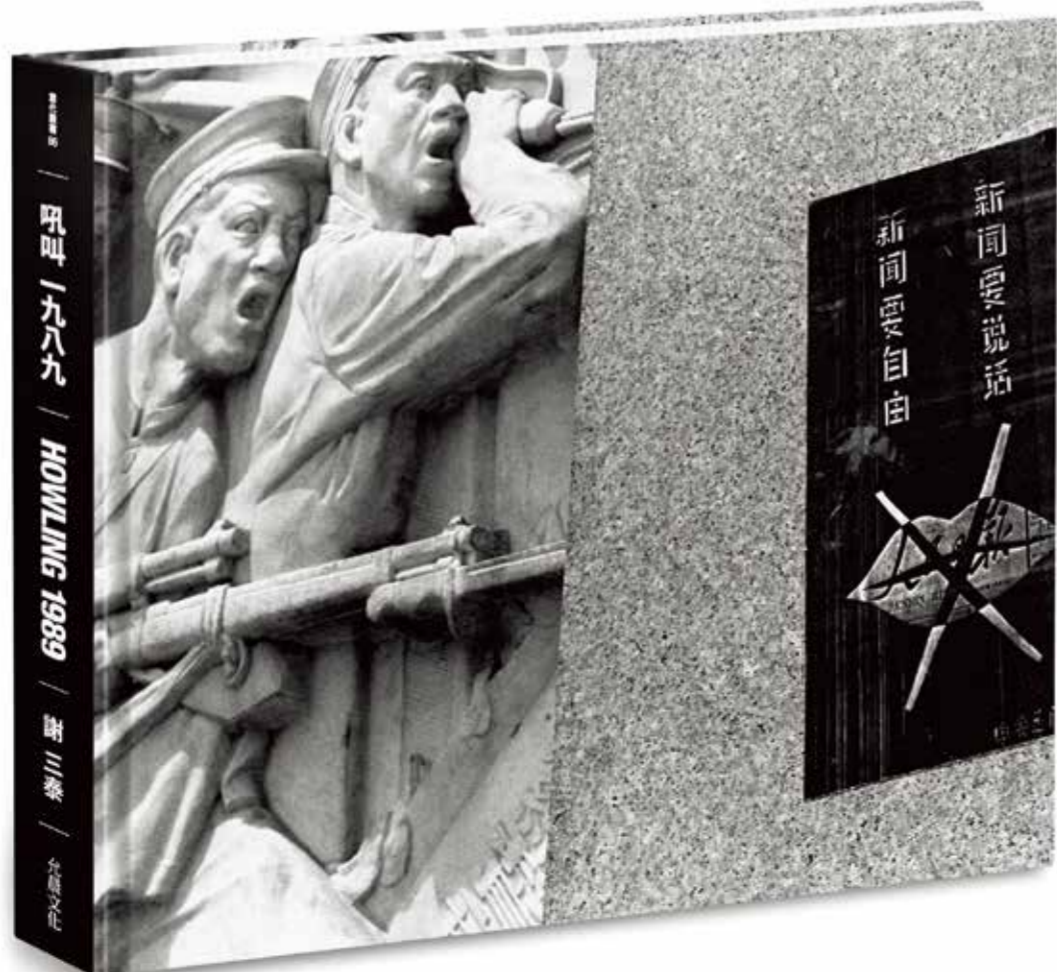
五月中，學生們絕食愈演愈烈，廣場上抗議人數愈來愈多，各式耳語傳言不斷，不時聽說解放軍已經兵臨城外，隨時準備以武力驅散鎮壓，風聲鶴立之際，記者們的安危也令人擔憂，尤其是像我這樣拿著相機的攝影記者目標更是明顯。台北報社不止一次希望我能撤離，尤其在中共當局宣布戒嚴後，天安門上的管制區不斷擴大，現場不時發生

小暴動，人們流露著害怕及不信任的眼神。報社明白表示不會再提供金錢，以切斷奧援逼我回台北，不只一次抗議，強烈表達想留在新聞現場的意願，但在身上只剩一百多美金和一張回程機票下，不得不妥協。5月23日天安門廣場上的毛澤東肖像遭三名工人損毀，我拍下最後一張照片傳回台北，帶著任務未完的遺憾，於隔天搭機離開北京，從新加坡轉機回台灣，距離我第一天踏上天安門廣場，總共四十日。

回台沒多久，六四事件爆發，天安門染上了鮮血，從新聞上得知王丹等學運領袖被捕，輾轉聽說某些認識的中國記者失蹤，我的心情五味雜陳，為廣場上那些為自由民主奮鬥犧牲的年輕學子感到難過，也惋惜自己錯失了見證重要歷史時刻的機會，但也忍不住想，若我仍在廣場，想必現在的處境會大不相同。

在我的記者生涯裡，採訪天安門學運是一趟沒有完成的任務，回台灣後，我在出差核銷單裡夾著辭呈，以離職抗議報社強制要我回來的決定，那些記錄北京學運的影像，跟心裡的遺憾，三十年來被隱藏於角落裡，一直到張照堂老師看見了它。

在一次為攝影博物館所做的口述訪談裡，張老師看到了我在1989年所洗的照片，也聽我說了當時的經過，他告訴我「不是非得待到六月四日才算完成任務，不要覺得遺憾，重要的是參與過，過程也很重要」。轉眼間，天安門學運已經30周年，這些塵封了30年的影像重見天日，看著那些如今已不復見的北京樣貌和廣場上奮鬥的臉孔，想起學生們浪漫的情懷，「生的偉大、死的光榮」！這是當時的一句標語，希望我留下的影像能表達學生們對民主自由渴望的千萬分之一。



# 回到一九二九的公會堂

◎林皎碧

走過總統府前、穿過博愛路、路過中山堂，這是高中三年上下課必經路線。少女時代太遙遠了，想不起來自己當年如何看待這棟古老建築物，也許只當一個理所當然的存在罷了。物換星移的幾十年後，怎都沒料到竟為中山堂內偶然發現的一批畫作，苦鬥近十年，甚至千里迢迢跑到日本到處奔波。

台北市中山堂即日治時代的台北公會堂，台灣總督府在總督官邸、總督府竣工後，為慶祝日本天皇裕仁登基，一九二八年著手籌畫在舊清台灣布政使司衙門舊址，興建一棟可以作為社會活動的官方集會場所。台北公會堂由當時總督府官房營繕技師井手薰設計，一九三三年十一月正式動工，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建造完成。台北公會堂為當時次於東京、大阪、名古屋而排名第四的都會公會堂。

二〇〇二年底台北中山堂整理倉庫時，發現一批日本人畫家的作品，主其事者雖不知道作品的來歷卻認為這批作品應當具有歷史意義，因此提議移撥給台北市立美術館。作品總計三十八件，其中一件的尺寸、裱褙與其他三十七件作品迥然不同，一眼就可辨認是出生台南的旅日畫家陳永森的作品。另外三十七件的尺寸約為三十五乘四十五公分，絹本彩墨，保存狀態不佳，創作年代不明，大抵只有署名和鈐印，裱褙的方式和材質都相同，判斷應該是同一時期的作品，推測是日治時代日本人畫家的作品，但是這批作品何以會放在中山堂？和中山堂到底有何淵源呢？

作品移撥到台北市立美術館後，當時的黃才郎館長認為有必要追出作品來歷和作者，指示我和另一位同仁負責研究。經過約二年的時間，於二〇〇五年一月由黃館長召開「中山堂移撥作品專案研究成果發表會」，初步的研究工作告一段落。由於同案研究同仁另有研究工作，館長指示下一階段就由我獨自負責。後來獲日本交流協會的援助，赴日進行為期二個月的調查研究。回國後提出研究論文《日本美術在台灣：中山堂移撥作品之研究》。回想起調查研究過程，當時雖知道這批作品必有其歷史背景及意義，卻無人知其來歷，甚至不知作者是誰？就算讀得出落款，七成以上並不知是何人。由於國內

的相關文獻資料不足，也無人可請教，只能一方面請日本友人寄書或協助搜尋資料，另一方面也請教過不少日本的相關研究者。不過研究工作停滯不進，直到有一天再度進庫房檢視作品，發現背板上有黑色鉛筆書寫的數字和文字。數字並不連續，文字則是漢字、片假名、平假名混雜，所有筆跡相似，應出自同一人，再三推敲與比對，推測是當年工作人員的簡易記載，數字可能是作品編號，文字可能是品名或作者姓名。最關鍵的突破點則是發現一九二九年（昭和四）八月二日《台灣日日新報》上的一則報導：

台北市役所為裝飾最近即將興建的公會堂，所購買的二百七十五件壁畫（譯註：此處為裝飾牆壁之繪畫）已經抵達，一日市當局表示：雖然公會堂已經決定和商工館合併興建，總督府從以前就主張有必要以諸如繪畫來當裝飾品。正當此時，得知內地某美術專門新聞社至各地的展覽會收集現代日本畫各流派一流畫家的作品，去年來台擔任台展審議員的松林桂月氏表示這是很難得的作品，若有經費應該及早購入，他又說從本島文化已逐漸提昇、繪畫的鑑賞力也提高、台展也開辦等各方面來考量，對那些無法至內地觀賞畫作的一般人而言，這正是絕好的機會。另外，當此之際若能將作品購買進來，不僅只是裝飾公會堂而已，也可以成為一個藝廊，無論是本島人、還是內地來的人當然都會很高興。（中略）購入的作品都在尺三、尺五左右的絹本，全部是日本畫、也都是各派中一流畫師的作品（後略）。

我依照這一份報導內容來應證作品，就作品尺寸、材質、背板編號三部分作比對，日本尺的一尺約為三十·三公分，尺三、尺五左右約是三十九·三×四十五·五公分，和三十七件作品的尺寸大致吻合。材質為絹本，也吻合。背板數字的編號雖然不連續，背板記載的最大數目二百七十三，並未超出當年購入總數的二百七十五。在此特別要說明，當時所謂的日本畫，與現在專指膠彩畫的概念並不相同。眾所週知明治政府最大目標就是歐化主義和國家主義，積極由西方引進的西式繪畫稱洋畫，相對於此，以國家主義立場把傳統各流派諸如狩野派、土佐派、圓山派、四派、琳派、南畫等稱為日本畫。

喜歡的領域，不只可以確保「工作不致於太痛苦」，積極面看，編輯人更可以隨著時間積累自己的領域知識，進而成長到得以和作者一起努力，為讀者提供更好的文稿。（其實，這時從編輯到寫作也只是一步之遙了。）

那些無法喜歡自己領域的編輯人，往往就只能原地踏步；日子一久，甚至還會散發出一股酸腐之氣。不能喜歡自己工作領域的編輯人，最大的工作危機是他全然無法欣賞作者的作品，更遑論欣賞作者全力以赴的意義所在。

好的編輯人能客觀地判斷作品的好壞，他最喜歡的稿件，就是幾乎無須動手修改的作品；甚至幸運地，成為一位全然樂在其中的欣賞者。心態上，他懂得欣賞作者的努力，其次則是能以編輯專業找回作者遺失的客觀眼光，並鼓舞作者前進。不好的編輯無法客觀地判斷作品，他老想著修補別人的作品，雖不是以沒事找事的忙碌，來證明自己的工作價值，但至少心態上是不夠開朗的，像個不情不願的登山客，抱怨這個抱怨那個，而無心欣賞沿途的風景。

這當然不是說，編輯就要「服侍」作者；不，編輯甚至不在「服務」作者，一個好的編

因此大膽推測由中山堂移撥的三十七件作品，就是一九二九年台北市役所為裝飾公會堂所購買的二百七十五件作品的一部分。

經過幾年的調查研究後，三十七件作品確實分屬不同流派及師承，能夠確認創作年代的作品都是一九二九年前所作，這兩點也可以作為佐證。至於作者到底是誰？只能從作品的落款、鈐印、畫風、筆觸著手。我帶著一份畫家清單，從北海道、本州、九州、四國，縱走日本列島踏尋畫家的出生地、紀念館和收藏作品的美術館、資料館、圖書館、寺廟，拜訪家屬、研究者及相關人士，也釐清一些事實。不過經過將近八十年的歲月，人事物有許多變化，真正踏上扶桑地才發現未必全如自己的計畫。

這些畫家網羅當時老中青三代，有活躍於院展、官展的畫家，有追求個性表現的畫家，也有力抵狂潮、復興傳統的畫家。時過境遷，匆匆已過四分之三世紀的今日，重新審視這些畫家，斐然有成，留名青史者有之；平實穩健，自成一格者有之；因故後繼無力，令人扼腕而嘆者有之；只留其名而不知其詳者也有之。境遇相差如此懸殊，死後未如生前受到重視，分析起來大抵有以下三原因：

一、當年能夠活躍展覽會場上，畫技精湛自毋庸多說，不過現存的作品流於通俗，缺乏個性和魅力。

二、經過一九二三年的關東大地震和一九四五年日本戰敗後的混亂期，作品流失，行蹤不明。

三、生前未能和同門師兄弟保持聯繫，獨來獨往，死後沒有門人發揚光大，家屬未能張顯其畫業。

無論如何，當我們把這些作品羅列出來，宛如重現時代的斷面，不但感受到日本近代美術形成的過程，同時也發現當時所面臨的問題。這些作品和畫家未必都經得起時代洪流的考驗，卻見證日本近代美術新舊的交替，也成為台灣和日本一段歷史的證物。這些作品的發現，對於向來以台展、府展作為研究日治時代台灣美術為主要依據，提供另一個研究途徑。若能早日將研究結果及這些作品公諸於世，對於台灣美術乃至日本美術的研究者而言，都是彌足珍貴的資料。話說回來，戰後出生的台灣女子，由日本交流協會提供經費，跑到日本去追蹤一批屬於台灣政府的日本人畫家的作品來歷，這個任務本身就相當弔詭。

日本這個看似熟識的國度卻有太多的陌



生，看似同文化卻存在太多的差異，因而被問及「對日本最深刻的印象是什麼？」往往搜索腦海千百回，一時之間有如打結般找不出一個合適的說辭。主因在於近代的日本軍閥作出不少傷害亞洲各國的事端，盤旋交錯於台灣、日本、中國的歷史三角關係上有太多的愛恨情仇，大部分的人被糾葛纏繞其間，始終無法忘卻上一代的國仇家恨，難以真情流露面對這一代的日本。我曾負笈東瀛四年，日本的師長和同學，甚至左鄰右舍都相當友善，而在那裡度過人生最充實的歲月。家父也曾赴日求學，祖父和姑母曾經在東京經營事業，因空襲而客死他鄉，至今不知屍骨葬於何處。因此每次前往日本，家母總不忘交代若能找出他們的往生地，記得去祭拜。撇開歷史的恩怨，我對日本這個國家並不仇恨。

這本書的問世起因於某出版社看到我的論文，認為這段旅程應該有一些別於論文的內容可以寫，希望能夠把旅途中的人事物寫出來集結出版，後因合約問題不了了之。幾經流轉，無意中和允晨出版社廖志峰社長相遇談起此事，由於帶著那份畫家清單踏上扶桑地時，心中有種去找祖父和姑母的錯覺，同時感覺有他們在冥冥之中牽引，才能夠得到許多人的協助，得以穿越時空穿越語言，得以帶回成果裝滿回憶，因此願意把這份虔誠和感動與大家分享。三十七位畫家當中的山口蓬春、荒木探令、高橋秋華，分別造訪過兩處淵源地，所以有四十篇紀行。書中編排不以造訪先後，大略以地區排列，瑣碎雜事，容此說明。

# 編輯七力

◎康文炳

認識的一些編輯人偶有要「退回」當作者的念頭。說是「退回」，並不是說編輯和作者的角色誰優誰次，而是當事人往往懷抱的是一種挫敗感——「夠了，讓我自己好好安安靜靜寫點東西吧！」

編輯要有成就感，除了市場的肯定、金錢的回饋外，大約還要有異於常人的性格吧——人格原型上比較接近「照顧者」，像母親，像護士，像有源源不絕的內在力量，看到受照顧的對象更好更美，就是最好的回報，不假外求。

「編寫兩棲」的詹宏志說，作為一個作者，他是任性的，不太考慮東西要寫給誰看，否則就寫不出來了；但作為一個編輯，他會照料各種讀者的需求，考慮各種銷售的情境，否則就不算是稱職的編輯人。

這不容易，如果可能，編輯人還是應該選擇自己喜歡的領域，迷戀文學的人就去編文學刊物，熱衷財經的人就去編財經刊物，享受生活的人就去編生活刊物……。選擇一個自己

輯人是要與作者並肩而行，並鼓舞作者的信心，以協助作品抵達讀者最可能的內在。（當然，這要作品本身含有足夠的能量才行。）

這就要求編輯人對作品涉及的領域，具備相當的知識。在專門的領域，編輯的知識往往不若作者，但至少要有能與作者「對話」的能力——可以提問，可以建議，甚至可以說服。但另一些屬於「編輯的知識」，好的編輯人卻決不能妥協。好的作品內容，敞開了讀者的心扉；而好的編輯，則關係著作品能抵達讀者內心的何處。

在這其中，「清晰度」是一位好編輯必須向讀者保證的首要品質，編輯決不能讓自己都不明白的東西印出去。編輯不是內容生產者，但某種程度而言，卻是內容文字（影像）的再生產者——他修剪贅詞，使文字簡潔；他將雜沓的長句分成短句，使語意明朗；他能讀懂文本，使敘述邏輯清晰，甚至建議作者調動結構，增刪內容。當然，他也釐正了錯別字與標點符號。

但無論如何，編輯人要免於疲累，也許應該有個信念：他服務的是一個特定的世界（文學的世界、財經的世界、科普的世界、社會科



學的世界……），而不是某一個特定的作者。當然，這是理想論，現實世界身不由己的情形多；但「理想」是一面鏡子，偶爾拿出來照一照，也好映照出我們自己此刻在現實世界的相對位置。

# 動盪的亞洲外交：一位外交官的證言

◎池田維



有關本書以訪談的形式付梓問世，首先我想簡單介紹一下其中的經過。我在結束四十二年任職於外務省（外交部）的職務後，轉任公益財團法人交流協會（二〇一七年起更名爲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代表，約有三年半的時間在台灣工作。在無邦交的日本與台灣之間，交流協會是代替大使館的窗口機關，屬半官方半民間的機構。

卸任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代表一職返國後，我受友人邀在立命館大學國際關係學部（系）擔任客座教授，有幾年的時間，我教學的主題是「日本外交與東亞」。在結束密集的講課之後，系上的石原直紀教授希望我能以「口述歷史」的形式接受採訪，這也

成了我將內容彙整並推出此書的契機。

石原教授在九〇年代初期曾任聯合國職員而派駐到柬埔寨工作，擔任 UNTAC（聯合國柬埔寨過渡時期權力機構）的新聞負責人。我當時是駐泰國大使館公使兼柬埔寨臨時代理大使，之後我擔任外務省亞洲局長時期，也曾有處理柬埔寨紛爭的經驗，所以我最初接受「口述歷史」採訪時，想到的主題便與柬埔寨有關，於是本書首先就從「柬埔寨的和平」這個主題開始談起。

結果，我接受了十幾次的專訪，本書的主題就從柬埔寨的和平問題擴及中日關係、日本與荷蘭戰爭受害者的和解，以及台灣問題。進行專訪的人除了石原教授外，還有研究中國及華人社會的專家小木裕文教授（立命館大學前副校長）、日本外交史的研究學者村上友章准教授（目前在三重大學，編註：日文的准教授，相當於中文所稱的副教授）。

回顧我在外務省任職的四十二年及在交流協會任職的三年半，我大致算了一下我從事亞洲外交關係的期間究竟有多長。當然，我派駐外館的工作與在東京外務省的工作不能相提並論，概略一算，四十五年之間約有二十幾年的歲月，我從事與亞洲有關的外交工作，這也是我將本書的主題設定爲「亞洲的外交」的緣故。

協助解決長達十幾年的柬埔寨紛爭，是戰後日本外交首度積極參與建立亞洲區域紛爭的和平。日本當時究竟扮演了何種仲介的角色，而對和平的建立做出貢獻呢？本書將針對日本所扮演的主導性角色一一說明，包括柬埔寨各對立派系所參與的東京會議之舉

行、與波布派（Pol Pot）之間就解除武裝問題進行數次對話與交涉、爲了柬埔寨重建所做的經濟支援活動等。

戰後的日本，首度派出自衛隊與文民警察，參與駐柬埔寨的聯合國維持和平行動（PKO），遺憾的是，有兩名日本人罹難，但我深感日本人既參與了 PKO，就有必要進行符合國際標準的行動。歷經逾二十年後的今天，加強使用武器的權限、承認「馳援警護」的必要性等集體自衛權的有限行使，終於變得有可能了。柬埔寨和平的過程當中所被言及的各種課題，對日本外交而言，現在還不失新意。

我任職於外務省時，花最多時間在處理的事務是與中國、台灣的關係。本書將轉變中的中日關係的軌跡，焦點鎖定於文化大革命、在北京備忘錄貿易事務所時代、中日關係正常化（建交）前後的北京、中日締結和平友好條約與「反霸權條款」、釣魚台主權問題、對中國實施經濟合作的開始、天安門事件的意義、天皇陛下訪問中國等，我以自身的經驗大致做一番回顧、綜覽。我認爲，重新省視在那些事情發生的時期，日中雙方究竟有何主張、之後又有何變化，是今後日中關係要健全發展所不可或缺的。

「如果將來，中國變得霸權主義的話，日本反對中國即可；如果日本走向霸權主義的路，中國反對日本即可。」說這番話的人就是當時在協商日中和平友好條約（一九七八年）時的最高權力者鄧小平。從現在看來，在經濟上、軍事上都變強大的中國，其對外姿態已偏離了鄧小平時代的「韜

光養晦」的方針，漸漸走向「中國優先」的領土擴張主義。

中國在習近平體制下，把東海、南海、台灣海峽視爲「內海」的姿態相當明顯。聽到「南海是中國自古以來的領土」這類中國近來的主張，若說中國未立足於國際法或國際規則，而是回歸到過去的「中華思想」（華夷秩序），這一點也不爲過。

與這樣的中國之間，是否能維持和平且安定的關係，對日本外交而言，今後仍是非常重要，且是相當困難的課題。

回顧我在荷蘭任職的五年間的工作，乍看之下或許與亞洲無關。但是，二次大戰後，從印尼返回的荷蘭人戰爭受害者當中，包括被稱爲「慰安婦」的人在內，一直懷有很強的反日情結。在法律上，這問題已解決，但與這些人之間的關係如何修復，是日本處理戰後問題之一環，不容置之不理。

與戰爭受害者團體的接觸、對話、交流，是如何進行的？慰安婦認定作業是如何進展的？這與「亞洲女性基金」的醫療福祉支援是否有關？書中將舉出具體例子說明。

二〇〇〇年五月，適逢日本與荷蘭交流四百週年，天皇與皇后陛下到荷蘭進行國是訪問，這象徵與戰爭受害者之間達成了基本的和解，將載於歷史中吧。荷蘭的例子與韓國的例子有很明顯的差異，現在這漸漸廣受矚目。

這件事與荷蘭統治印尼有關，而且也與處理日本和亞洲鄰國「過去的問題」有關，所以本書將此視爲亞洲外交之一環做說明。

## 秋刀魚的滋味：釣台小語

◎廖志峰



裡的，是自覺比較重要的作品。然而，這些文章的意義到底是什麼，還要等到讀者閱讀後，真正的意義才串連起來。在我一己的閱讀經驗裡，所有作家個人私密的掙扎，創痛，愛憎，記憶，在進入讀者心中後，引起了某種化學反應般地共感，連結產生了，意義於焉浮現。

文章寫的雖然是一己的所歷所思，不希望過於濫情或矯情，因此我採取一種較平淡的方式來書寫，在平淡中或能讀出一種韻味，這樣的平淡也就真實了，也許會更持久。這和我觀人的方式，取徑相同。從二〇一五年起，每兩年出版一本書，這已是第三本了，每本文思、寫法或有不同，關懷仍不外閱讀與時代雜感；而時代又縮繫著身世記憶，題材難免駁雜。當我開始爲文章分類時，忽然想起大學時讀的一本奇書，《世說新語》。《世說新語》的分類和寫法，別出心裁，讓人十分著迷。雖然書寫形式和內涵，與原書毫不相涉，權借爲分類參考，把全書五十八篇文章分爲四類：人情第一，地誌第二，說書第三，物語第四，總成一書。

和前兩本不同的是，這次還放膽請了幾位師友爲拙著寫推薦語，除了以壯聲勢，也作爲從業三十年的紀念，然而，我更想知道的是他們的想法和讀法。這些推薦者，認識多年，亦師亦友，平時互動不少，知我較深，寫來應會更爲深刻，或許也有助於讀者理解。朋友們知我向不輕易開口，這次爲自己開口求序，有如自薦，難免尷尬不安。所幸，

不以爲忤，無一推辭。推薦語不論長短，精到入理，有醒題之助。衷心感謝卜大中、王德威、王盛弘、平路、陳樂融、單德興諸位師長畏友，實是厚顏。

我在一九九〇年三月某日走入的大樓，從沒想到，其後的三十年，我會在此度過大部份的青春。三十年的概念是什麼？時間跨度上，從青年到中年；而在變動快速的人生中，它也已比許多人的婚姻都還來得長。這份沒有合約的合約效力到底如何產生，我不太明白。記得剛進到這棟大樓時，一次遇到大樓陳主任，他一時興起看起了我這個大樓新鮮人的命盤，之後，給了我四字結語：「堅守釣台」。我當時一心想離開，心裡暗哼了一聲，並沒當真。三十年過去了，我竟還在這裡。我真該問：釣台之後呢？

回首來時，我衷心感謝我的老闆吳東昇博士，如果不是遇到他，我應該不會在這裡停留這麼久；如果不是他的寬容和信任，許多沉重而精彩的書，不可能從我手上編輯出版。曾有一次，他笑著對我說：「你編的書也太恐怖了。」我懂他所說的，「恐怖」的意思；他應該想了很久。我也要感謝所有支持允晨的作者，我在編輯台上所經歷的風景，其實是我人生的壯旅，我從沒想過可以走這麼遠，甚至走到天涯海角，追尋作者的足跡。書中提到的作家片段，絕無冒犯之意，只是想藉此分享我透過作家所看見的世界。我更感謝所有支持我的朋友，沒有你們默默地支持，出版這條路，我應會躊躇而行。

人到中年，不能免俗地回顧起自己的人生，許多消失的風景，只能在文字裡復現追憶，希望不會過於耽溺；書和電影是我最樂意分享的事，寫下觀影或閱讀當下的感動，也是寫給自己的備忘。當我在二〇一四年婉辭了《文訊》的專欄後，以爲自己自由了，但是作爲一個文字工作者，真正的自由其實要一直到最後。說到底，我們其實擺脫不了字的咒力。這本書之所以能結集成書，其實是許多同行敦促而成，如果不是他們約稿，許多文章根本不會寫出來，也要感謝他們提供寶貴的版面刊登。謝謝《聯合報》宇文正主任、王盛弘副主任，《自由時報》藍祖蔚副總編輯、蔡素芬主任，《印刻文學生活誌》初安民總編輯、簡白副總編輯，《文訊》封德屏總編輯，《OPENBOOK 閱讀誌》的周月英總編輯，《財訊》康文炳副總編輯、邱奕嵩主編，《安可人生》高有智策略長，《想想論壇》賴秀如，《思想坦克》蔡其達，《鏡週刊》林文珮，《幼獅文藝》李時雍前主編，以及《書香遠傳》、《人間福報》、《新書月刊》，謹此致謝。希望沒有遺漏。

即將進入出版的第三十年，就算不是賽車場上的最後一圈，也是倒數幾圈了，我和所有的出版同行，其實一直在相同的環型跑道上競逐，說不上來這是一種怎樣的心情，有一種必須不斷奮力向前的奔馳，又帶著宿命的磁吸力互相牽引，直到終點。文字書寫成了一种記錄見證，也是編輯台下的副產品，聊記吾曾。這本文集以「秋刀魚的滋味」爲題，難免新意不足，然而，確是我真實的心情，謹以此書獻給我的父親，感謝他給予我足夠的自由，追尋自己人生的道路，無論風雨。